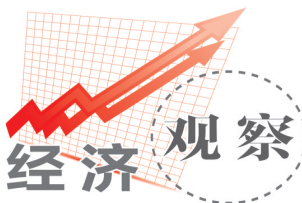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 赵忠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了全面进步,有力促进了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发生深刻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重要保障。全会确定对外开放领域的重点工作是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这些重点工作为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深刻认识扩大开放的时代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当前面临的时代背景作了深刻的概括,即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民群众新期待。中国这艘巨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惬意和轻松,要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都要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时代主题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但是当今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战、科技战挑战全球治理规则,科技进步加速变革生产和生活模式,增大了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人类社会来到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天等于二十

年”历史激荡的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在不确定中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新征程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遇到激流险滩。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来破解难题,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年前我们开始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今天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变与不变之中,我们要深刻认清开放的重点方向。

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已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涉及开放什么、向谁开放、如何开放三个核心问题,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标准制定则是当前加快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

首先,开放什么?这个问题围绕三对关系展开,即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随着我国制造业领域对外资全面开放,今后的重心将转向服务业开放。服务业开放更多的是国内法规政策,重心势必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措施。毋庸置疑,我国服务贸易相较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存在一定差距,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升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力,塑造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其次,向谁开放?当前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向东开放”“向西开放”并重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与此同时,通过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缩小了区域间差距,实现了社会更平衡的发展。向东继续深化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贸合作,向西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亚、欧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前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出口占比不断上升,这是好的信号,但也需要稳住发达国家的基本盘,因为在某些方面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是发展中

国家无法替代的。在发达国家几个圈层中,日韩周边市场、欧洲市场是重中之重,我们需要稳固“根据地”,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

最后,如何开放?这个问题涉及九个方面:一是主动对标对表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正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举措。二是主动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我们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今后签署更多自贸协定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历史经验表明,在顶层设计上要明确“多予少取”的原则,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可以是较大幅度的多予少取和单边开放,不要担心让步大了会对中国产业造成影响。三是对于中国实践走在世界前列的领域,亟须推出“中国方案”,比如在跨境电商领域,可以通过多边、区域和双边谈判将中国跨境电商海关监管模式以及所谓“新四小龙”商业生态推广到贸易伙伴国,进一步释放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潜力和世界跨境电商发展的动力。四是对于全球尚未形成统一性国际规则的“新领域”,及时抢占新业态领域的国际规则话语权。目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领域有“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基于中国领先世界的实践,积极制定符合中国利益诉求和发展理念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五是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激活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重要规则,如提倡完善绿色产品补贴规则,恢复、扩展世贸组织的“不可诉补贴”条款等。六是在规制协调方面,加快国内规制与国际之间的协调。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制度设计,要尊重各国的制度性差异,在此基础上,寻求各国在国内规制领域中的“最大公约数”,通过规制融合降低企业经营的合规成本,同时守住安全底线,维护国家利益。七是在管理提升方面,借鉴国际先进做法,依据国内实际情况,在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信贷、电力、纳税、贸易、执行合同、企业注销等方面,进一步进行制度优化和管理提升,涵养宜商生态。八是在标准制定方面,一方面持续推进国际先进标准“引进来”,提升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的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加快国内标准“走出去”,研究制定跨境电商、铁路运输等领域的新标准,全面推进中国标准“走出

去”。九是赋予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更多开放自主权,赋予自贸试验(港)区更多立法权以及适时扩大试验范围。在已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区域面积和省级自贸协同创新区规模,以此充分释放“规模经济”优势。

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重要方向。当前,我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已转变为更广泛地引入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面临全球产业重构与经贸深度调整,国际合作的空

间受到美西方的挤压,需要更加主动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内外协同发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一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努力克服困难障碍,持续推进国际教育科技交流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二是不断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西方“脱钩断链”的企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为进一步促进国内国际企业良性竞争与健康发

展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支持和保障。

三是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五通”措施,拓展新领域合作空间。持续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策沟通与产业对接,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体系。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加快推进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拓宽欧亚经贸合作布局。加强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促进中外人员工作、教育、旅游互访便利性。此外,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上合组织、中非合作,扩展国际合作渠道,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根本上要靠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领域的制度创新,呈现立柱搭梁、整体推进的特点,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深刻改变了城乡发展面貌。

通过改善城乡要素配置提高发展效率。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要素配置层面的集中表现,是城乡要素交换关系不平等以及生产要素由农村大量流出,造成乡村发展活力和动力不足。近年来,围绕城乡要素配置的改革,大体路径是通过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

制度壁垒,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乡村集聚、向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流动,带动乡村产业要素配置结构、经营组织方式等变革,进而达到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目的。

通过优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增进民生福祉。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最直观体现,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有效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必须改善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格局。近年来,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改革,重点是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通过不断加大公共资源向“三农”配置

的力度,持续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深度覆盖,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通过推动城乡治理一体化提升治理效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分治格局随着人口、要素的开放流动而逐步打破,但并没有根本消除,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近年来,围绕城乡治理的改革,突出以构建城乡一体的空间规划管制制度和现代化社会

治理体制为引领,推动城乡空间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一体化。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乡治理各方面的深度应用,改变了传统治理路径,提高了城乡治理一体化水平。

当然,也要看到,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塑造新型城乡关系,依然面临一些堵点卡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要素流动的整体性、协同性不强。提高要素组合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实践中,城乡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不匹配的现象还比较突出,阻碍要素下乡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人才、资本、管理、技术等向乡村流

动的协同性不强,导致要素配置整体效率不高。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取得一定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层面的改革,重点应放在提高要素流动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要素配置效率上来。

二是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通过持续推动公共资源优先向农业农村配置,我国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是,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人口—设施(服务)不匹配的现象,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闲置,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目前我国城乡形态仍在不断变化,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要把效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强化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提高整体利用效率。

三是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产业协同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因此相比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而言,其复杂性、长期性特点更为突出。近年来,新技术为城乡要素跨界和产业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城乡产业互动性、互补性增强,但城乡产业的关联效应和融合水平还不高。要进一步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着力推动产业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和融合发展。

四是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待完善。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下降态势,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并没有缩小,保持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挑战在增多。与此同时,农村内部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也比较突出,

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卡点

□ 涂圣伟

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较大。要进一步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有效缩小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堵点卡点,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要加快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

制度壁垒,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分类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增强城乡要素流动的整体性、协同性,引导生产要素向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集聚。

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方面,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和形态,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支持探索县城融合发展的多元化模式和路径。

在深化农村制度改革方面,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效能。紧紧围绕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一主线,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成长性、安全性、均衡性“三位一体”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坚持城乡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进一步

完善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按照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的原则,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合理确定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合理配置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等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度和公共服务便利度,让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

5% 来之不易

□ 张立群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这一增速与年度预期目标一致,其中,创新驱动的产业技术升级持续活跃,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结构调整持续深化带来新挑战,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发展,能够实现5%的经济增长,着实不易。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持续发力。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困难挑战,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强的政策落地,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同时也要看到,需求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出口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受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的制约,出口整体

仍呈较低增长态势,上半年出口(美元口径)同比增长3.6%。内需方面,上半年消费同比增长3.7%,其中6月份同比增长2%;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3.9%。从趋势看,上半年消费与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均呈下降态势。综合来看,需求不足问题仍要重视。受需求不足制约,工业和服务业增速均有回落态势。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较一季度降低0.1个百分点;上半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较一季度下降0.6个百分点。需求不足问题的发展,使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二季度GDP同比增长4.7%,较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

需求不足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是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面对的严峻挑战之一。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前景广阔,既包括仍然存在的巨大结构变化潜力以及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也包括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和丰富的人力

资源、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生产要素供给;还包括十四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在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支持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广泛,进而带动生产和供给持续较快高质量发展。这个过程也会支持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

加快增长。国内经济大循环会全面畅通并加快运转速度,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结构性矛盾会持续较快得到解决。包括充分就业支持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较快扩大,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等等。可见,只要尽快扭转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解决需求不足困难,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展现持续较快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按照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随着相关方面改革措施的加快推进,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能力将显著增强。同时,伴随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制定方面相关体制机制,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预计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资建设能力将显著增强,由政府公共产品建设投资推动的需求扩大、企业订单增加将持续发力,进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生产和投资活跃,就业形势好转,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消费需求持续回升。综合看,随着相关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能力将显著提高,就能够在市场引导需求收缩不断发展时,通过大力加强政府投资,起到扩大内需启动键的关键作用,有效扭转目前的需求收缩态势,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8